

# 人文清园

REN WEN QING YUAN

王元化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人文清园

R E N   W E N   Q I N G   Y U A N

王元化 著  
杨 焄 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清园/王元化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5

(大家散文文存)

ISBN 978-7-5399-3528-7

I. ①人… II. ①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4020 号

书 名 人文清园

著 者 王元化

编 者 杨 焄

责任编辑 王宏波

责任校对 王维嘉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ppt://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8.5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528-7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辑一 往事沧桑

- 3 自述——《清园论学集》序  
8 致友人书：自述  
11 我的三次反思  
18 重返清华园日记  
23 走自己的路  
24 告别张可

## 辑二 师友追忆

- 27 记汪公巖  
33 记任铭善  
36 记熊十力  
41 再记熊十力  
47 记韦卓民  
50 记郭绍虞  
54 记顾准  
57 再记顾准  
60 记辛劳  
67 记满涛  
70 记张中晓  
74 再记张中晓  
79 记王瑶  
83 记钱钢

### 辑三 文史覃思

- 89 孔子最早的神圣化
- 91 谈鲁迅与太炎
- 95 谈胡适自传唐注
- 102 谈杨遇夫
- 107 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
- 111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亲情、友情、爱情
- 114 老年爱
- 116 和新形式探索者对话
- 120 模仿·作风·风格——《文学风格论》译本跋

### 辑四 思辨抉微

- 127 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
- 138 简论尚同
- 142 简论道德继承
- 147 近思札记
- 163 《思辨发微》序
- 167 《思辨随笔》序

### 辑五 雕龙识隅

- 173 《文心雕龙》创作论八说释义小引
- 177 《文心雕龙创作论》第二版跋
- 186 《文心雕龙讲疏》序
- 190 《文心雕龙》研究散论——一九八三年在日本九州大学的演讲
- 197 《文心雕龙》的若干范畴——一九八七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演讲

### 辑六 莎评絮语

- 211 在莎士比亚塑像揭幕仪式上致词
- 212 读莎剧时期的回顾

232 泰纳《莎士比亚论》译文题记

231 兰姆《关于莎士比亚悲剧上演问题》译文题记

236 柯勒律治《理查二世》译文题记

### 辑七 戏曲漫谈

241 京剧札记

246 谈基础和流派

248 京昆丑角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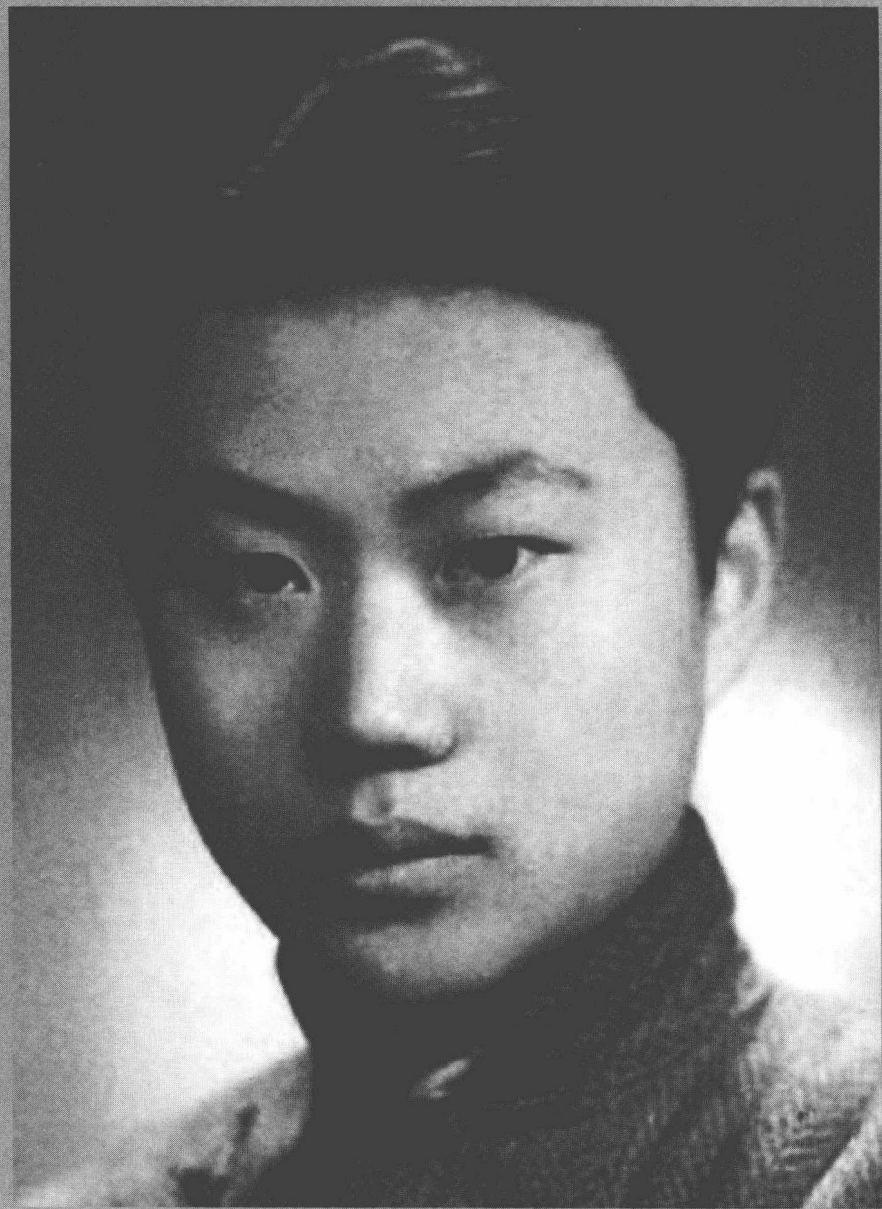
250 京剧《伍子胥》

253 汉剧《宇宙锋》

256 川剧《帝王珠》

259 秦腔《赵氏孤儿》

261 编后记



辑 一

往事沧桑



# 自述

——《清园论学集》序

学不干时身更贵，  
书期供用老弥勤。

——公严先生诗句

我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写作，到目前已有五十六年了，但认真算起来，我从事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并不多。生活环境的变化使我有好几次不得不放下笔来。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一九四九年，我只写了几篇短文。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到一九七九年未平反，在这二十多年中，由于偶然的机缘，我才鼓起勇气记下当时的感受。我并不奢望这些文字将来可以发表，只是为了排遣生活的空虚，想在流逝的岁月中留下一点痕迹。这期间我两次患病，一次在三年灾害时期，因营养不良得了肝炎。一次在“文革”前两年，正是我写作《文心雕龙创作论》进入高潮的时候，突然少年时期所患的静脉周围炎（眼底回血管出血症）复发了。一天早上醒来，我的右眼一片黑暗，完全看不见了。我对这意外的打击感到恐惧。那时写作是我的唯一寄托，我不能想象眼睛完了我将怎么办。在这愁苦的日子里，我的亲人为我去找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我接受了何章岑医生直接在我眼球上的注射，每周一次，一共打了九针。由于疗效不大，剩下的一针就停止不打了。当我从消沉中渐渐振作起来，我还不能使用目力，只有请求父亲帮助。那时他已八十出头了，早已从北方交通大学退休回来，和母亲住在一起。每天他步行到我家，以极大耐心为我阅读资料，作我口述的笔录。现在我还保

存着他为我誊写的八大本手稿。我的眼病刚刚有所好转,持续十年之久的“文革”发生了。

我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青少年时期是在战争烽火中度过的,接踵而来的则是运动频仍的严酷岁月。从事研究工作,需要摆脱世事的困扰,无拘无束地进行潜心思考。黑格尔于一八一八年荣膺柏林大学的讲席,他一登上讲台就在开讲词中说:“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现在现实潮流的重负已渐减轻,使得几乎已经很消沉的哲学也许可以重新发出它的呼声。”(大意)黑格尔说的使精神返回自身那种内心的宁静,不是生活在动荡环境中的人所能享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艰难岁月也使人有可能将环境施加在自己身上的痛楚,转化为平时所不容易获得的洞察力。没有经受这种痛苦,没有经受环境施加给人的无从逃避的刺激,就不可能产生这种深沉的思考。这是在远离尘寰的书斋中苦思冥想所不能得到的。大概神秘主义者雅科布·伯麦(Jakob Böhme)把“苦闷”(qual)作为能动的本原就含有这种意思吧。为什么有不少人一旦离开养育他的土地,在尚不熟悉的新生活中过着很少变化的平静日子,思想反而逐渐枯竭起来呢?恐怕那些曾经使他感到不安的刺激因素的全然消失,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应该把环境施加给我们的影响,作为我们丧失宁静生活的某种补偿,虽然这并不是我们所追求、所愿意的。相反,我们却要命运所作的这种安排付出重大的代价。

忧患意识长期以来促成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升华。太史公所谓“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著《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以说是对一部中国思想史所作的钩玄提要的说明。我以为不能单列举“五四”时代那些把学术当成实现某种意图工具的学人,作为维持“救亡压启蒙”这一观点正确性的唯一依据。我们应该从他们的思想本身去找寻问题的答案,纵使当时没有救亡的压力,他们也不会作出其他的选择。直到今天还有人把这一时期和他们不同的另一些人,如王国维、陈寅恪

等,看作只是一些从事纯学术研究的冬烘学者,殊不知他们对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并不比前面所说的那些人逊色。他们以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弘扬传统,重建中国文化,未始不含有救亡图存的动机,但这并没有损害他们的学术研究。

一位友人曾从我的书中摘出这样一些句子:“人的尊严愈是遭到凌辱,人的人格意识就愈会变得坚强起来。这是施加暴虐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心灵的相契有时比观点上的分歧更为重要。”“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他认为这些见解不是来源于读书,而是直接来自阅历。这话是不错的。生活经历激发了思考。这些年我所写的谈龚自珍、谈韩非、谈公意、谈激进主义、谈杜亚泉,以及对于黑格尔、对于“五四”等等的反思,也都是在同样情况下进行的理论探讨。在历史和现在的关系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的“史家对已往史实的兴趣永远是和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这句话最为透彻。但它也包含了一条界限,史家一旦越出这条界限,把对当前生活的关怀变成用历史去影射现在,那么也就使历史失去了它的独立自主性。这种现代关怀是隐含在历史研究之中的,史家本人往往是不自觉的、无意识的。

我希望读者从这本论学集中可以看出我的思想历程。我的早期文字,在一九四五年编第一本集子时,大部分就未收入。这些文字多半是抄袭苏联的理论模式,很少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我从这种模仿中挣扎出来,已是孤岛时期结束以后。日伪直接统治下的上海成了一个恐怖世界,我的许多藏书都自行销毁了,自然更谈不到发表文章,但幽居生活却使我可以沉静地思考。我对教条主义感到了厌倦。浸透着人文主义精神的西方十九世纪文学,几乎成了我当时的唯一读物,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也许这是由于小时在家庭受到邻人爱的基督教义的影响,使我对这些文学作品产生一种认同感吧。抗战初,我结识了满涛,他刚从美国经欧洲返国。由于共同的爱好,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都是鲁迅的崇拜者,喜欢他的小说的沉郁,也欣赏他的杂文的犀利。我们对鲁迅

精神作了自以为深刻其实不无偏差的理解,以为在论战中愈是写得刻骨铭心、淋漓尽致,也就愈是好文章。偏激情绪对于未经世事磨炼、思想不够成熟、血气方刚的青年来说,并不是什么好的征兆。一九五五年,我受到胡风案件的株连,引发心灵上的大震荡,接着陷入一场精神危机之中。在隔离审查的最后一年,我被允许阅读书籍。这时我完全被黑格尔哲学所吸引。我认真地读了可能找到的他的著作,其中《小逻辑》、《美学》、《哲学史讲演录》三种,成了我十分喜爱的书。仅仅《小逻辑》这部著作,我就读过四次,每次不止读一遍,现还保留两次写的笔记,共有十来本练习簿。我沉潜于思辨的海洋,不再像过去那样迷恋于令人心醉的激情世界了。

这以后有许多年,我只读那些不容易读懂的书,以为只有这种著作才蕴涵深刻的哲理。幸而那时以艰深文浅陋的贗鼎之作,尚不像今天这样弥漫于理论界,而我对它们也有了一定的识别能力。我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哲学范畴重新衡量与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过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了我很大的影响。直到这两年,当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反思时,我还是以它去清理由惰性和习惯所形成的偏见和谬误。这不仅限于对黑格尔本身的再认识,而且也是对“五四”以来在进化论思潮下所形成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进步与反动等等既定观念的重新估价。这些观念至今仍作为知人论事的标准,牢牢支配着思想界,成了遮蔽历史真相难以破除的偏见。

我感到,自己没有充分掌握材料并对材料作出仔细的鉴别和考察,是造成误差的原因之一。这就很自然地联系到传统的训诂考据问题上去。这方面的思考使我发觉,过去所深信的所谓逻辑

和历史一致性的说法其实只是理性主义的过分自信。在历史的进程中虽然也可以发现某种规律性,但历史和逻辑毕竟不是同一的。逻辑推理不能代替对历史的实际考察,史家的史识必须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实证上。清人钱大昕说训诂考据乃“义理所由出”,也就是阐明此义。可是长期以来,只有观点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看法始终占据上风,而训诂考据则多遭藐视。据说一位论者准备批“四书”中的儒家思想,竟以为用不着去读原著,只要请人把“四书”中的有关观点罗列出来供他使用就行了。这可以作为上述那种看法的一个实际例子。不必讳言,过去不少训诂考据文章,往往流于琐碎,有的甚至变成了言不及义的文字游戏。但不能因此断言训诂考据是无用的,正如不能因为曾出现过大量“假、大、空”的理论,就断言观点义理是无用的一样。我不同意把观点义理置于训诂考据之上,作出高低上下之分。这个问题不能抽象对待。对于庄稼来说,下雨好还是晴天好?要根据具体情况才能判定。对于研究工作来说,观点重要还是考据重要?也属于同类性质的问题。马克思曾经嘲笑莎剧《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us*)中的美尼涅斯·哀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荒唐地把人比作他自己身体的一个断片,由一个个体供给其他所有个体以营养。他认为各司不同职能的人是像珊瑚一样,每个个体都供给全体以养料。我觉得,学术工作所采取的各种研究手段,其作用虽有大小,但也应作同样的理解。庄生所谓“泰山非大,秋毫非小”,也即阐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之理。这句话隐隐含有平等与自由的意蕴,是值得细细玩味的。

一九九四年八月记于沪上清园

## 致友人书：自述

你嘱我谈谈自己的学术思想，由于时间匆促，来不及多酝酿一下，只能就你的问题，提出一些简单情况，谨供参考。

我深深服膺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这里所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哲学范畴重新衡量与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过追究的范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过的前提的。就这一点来说，批判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积极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德国古典哲学家大多是这种批判精神的发扬光大者……

批判主义可以是怀疑一切的，也可以是为了摆脱虚伪、迷妄、奴从，以保持独立思考。我认为“五四”时代的批判精神兼有上述两种性质，但基本上还是以后者为主。这一点不容忽视，自然，由于前者往往夹杂着某些感情色彩，以致阻挠了对传统文化作深入探讨（像胡适这样一位平和的学者，也留下了这种时代的烙印）。海外某些学者把“文革”的大批判和“五四”的批判精神混为一谈，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不知道中国大陆学人多经磨难，不会不理解“文革”的大批判。我始终不懂为什么这样简单明了的事实，竟会引出这样难以解开的死结？

我对传统的认识和理解，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近几年中，这种变化很大。来信指出我对传统的看法和今天某些反传统

的青年有分歧,这是对的。我要补充的是,我也不赞成用比附的方法把传统现代化。例如“五四”时代胡适所走的路子就有这种倾向。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更早以进化论观点评述先秦诸子的博士论文,就是以西方哲学为主体来比附以至剪裁中国古代哲学的例证。这种路子类似我在此次康桥之会上所听到的西体中用说。这提法最早是由我的一位友人黎澍提出的。此说有意无意间受到了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毛泽东在三十年代,曾按照斯大林的“国际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的原则,提出了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问题,引出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在延安后来又波及大后方的民族形式的讨论(可参考胡风的一本专著《论民族形式问题》)。其影响延续至今。西体中用说可以说是从“国际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这一模式衍化出来的,尽管提出这种说法的人申言两者并无什么瓜葛。

另一路子则是王国维、陈寅恪、汤用彤等所走的中国文化本位的路子。他们曾留学西洋,具有相当深厚的西学素养,都是中西兼贯的学者。这里顺便说一下,人们对王陈二人多有误解。由于王国维一直蓄辫,后来又自沉昆明湖,在不少人心目中,一直被当做殉清的冬烘人物。但只要读《静安文集》中的《论近年之学术界》与《论新学语之输入》,即可知他的思想是很开明的。他对中西文化的见解,甚至直到今天仍可作为我们的借鉴。陈寅恪则由于曾自称其学“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近乎湘乡南皮之间”,颇费人猜疑。加以他又始终用文言写作,而被胡适视为遗少气。但他的思想并不保守。他曾称颂《再生缘》中蔑视君权父权夫权的女性。在西学造诣上则更高于王国维。我觉得,我们不可不注意陈寅恪如何使西学融于中国文化,也不可不注意王国维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到《宋元戏曲考》在融化西学观点和方法方面的演化之迹。过去我们太侧重于对当时人的理论探讨,而忽略了他们在实践所展示的意蕴。研究中国文化,不可避免地需要以西学作为比较的参照系,但又不可以西学为主体,用中国文化去比附。六十年代初,我撰《文心雕龙创作论》时,虽对比附存有戒心,但上述以西学

为主体的影响仍然存在。这使我偏重于揭示《文心雕龙》中与西方美学相同或相似的原则，而放松了对其中不同于西方美学的独立特色方面的探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自然，在重建中国文化的问题上，如何使外来的融化于本土的之中，那将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学术界在这方面提出过不少方案和主张，但我以为我们应当切忌笼统地提问题，匆忙地下结论的做法。

现代文学史著者往往忽略了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等人在这个时期的作用，认为他们只是立足于旧营垒而与“五四”新时代毫无关系的过时人物。其实在他们身上所显现出来的那种“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应当被视为与“五四”的时代思潮是同流合轨的。他们的学术成果，在许多现已逐渐褪色变得十分黯淡的文化遗迹中，仍显示了自己的光泽。这是我过去所忽略的……近年来，中国大陆学人在反思，探讨了自己的曲折经历。这是在默默中进行的。他们还没有把自己的新的认识形诸笔墨，一些思想的变化隐埋在各人的心田里，等到成熟之后，才会破土而出，让世人了解它们的究竟。我对自己屡经批判而保留下来的某些观念，也由于反思而感到震撼，我曾像画记号似的一点一滴地写在新出的两本书：《文心雕龙讲疏》和《思辨发微》的序言里。我相信你大概已经从我近来所写的文字中，窥见这些思想变化的轨迹……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 我的三次反思

在我从事写作的六十余年中，我的思想有过三次较大的变化。这三次思想变化都来自我的反思。我是在严格意义上使用“反思”一词的，即指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和检讨。我可以把这三次反思简述如下。第一次发生在抗战时期一九四〇年前后，那时我入党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转译过来的苏联文艺理论影响。举例来说，一九三九年我写的《鲁迅与尼采》一文，发表后有较大影响（甚至至今还有人提到它）。但我坦率地说，那时我并没读过多少尼采著作，我的许多看法大多袭自苏联一本论尼采的著作。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大后方传来了一股学习古典名著的热潮，孤岛也受到了影响。阅读名著，座谈心得，一时蔚然成风。我在读中学时热爱鲁迅，这使我的思想有了一点基础，所以在四十年代读名著的诱发下，很快就识别了自己身上那种为了要显得激进所形成的左的教条倾向。还要补充说，当时一些朋友，特别是满涛，对我这次反思起过很大作用。我们两人常为一些文艺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他曾发表文章，批评我的机械论，指出我在艺术与政治的观点上，以及从藏原惟人那里转借来的所谓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双重标准等是错误的。这些争辩十分激烈，但并不影响我们的友情。不过，我纵然明白了自己思想中的问题，倘要克服，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直到沦陷区时代即将结束，时间已过去了三四年，我才取得一些进展。当我把我写的一篇小说《舅爷爷》和评论曹禺改编《家》的文章给一位朋友看时，这位朋友禁不住说：“真的脱胎换骨了。”这时我也成为满涛所喜爱的契诃夫作品的爱好者，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则主张回到马恩的原初理论上去。